

外语教育学框架下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能动性 & 客观世界视角

张天伟

摘要：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既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内容，又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语教育学的框架下，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期和实施期分别体现了不同参与者的能动性及其与不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外语教育政策中的个体能动性通过汇聚成集体能动性，使政策研究与基础理论、教育实践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动态发展，共同构建外语教育学体系。

关键词：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外语教育学；能动性；客观世界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23)03-0065-07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research o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have reflected agency of different par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 The collective agency converg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l agency has connected policy research with both theorie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eir interface, interactions, interdependen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have jointly built a disciplin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polic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agency; structure

1. 引言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以下简称 LPP) 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语教育学作为交叉学科,以外语教育实践为出发点,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各维度之间普遍联系,共同构成了外语教育学这一整体。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各级政府、社会、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都会发挥其能动性,而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又受国际关系、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发展、教学实践、教育目的、教育技术等多维度的影响。在学科基础上,语言学是根本,但它又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作为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陈平(2021)探讨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四种主要方式,分别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超学科。超学科研究一是范围更广,难以纳入现有学科研究范式,二是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相关学科,其组织结构和运作特点也比其他学科复杂得多。在后疫情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研

究越来越具有超学科的性质,从早期的计算机辅助外语教育到基于网络和资源的外语教学、学习和评估,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等,这些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宏观或微观的语言政策研究,需要外语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又反作用于外语教育政策,使其不断修补、完善。因此,从超学科属性研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采取能反映这一复杂关系的新研究视角。

能动性与客观世界(agency and structure)是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视角之一。外语教育政策是能动性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外语教育实践中,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互相关联,进而影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修补、实施和效果评价。在外语教育学框架下,如何解读外语教育政策的能动性?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又是什么关系?本文将在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视角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2. 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研究视角

2.1 研究背景

2021年,《语言规划中的当前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刊出专刊对能动性和

客观世界进行了探讨,表明这一问题已经引起 LPP 学界极大关注。能动性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不同的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能动性一般指个体影响语境而不仅仅是对语境有所反应(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从 LPP 角度而言,能动性被理解为在政策环境内,政策被不同的行动者解释和诠释,而不是简单地、不加批判地执行。而客观世界包括社会中群体和个体的关系、行为和机构规范的持久模型、意识形态和认知框架,这些因素制约着社会中的行动(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能动性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Johnson & Ricento (2013) 认为客观世界和能动性之间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两者之间,能动性起着基础作用。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接受者、评价者,如政府、学校、社区、教师、学生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LPP 研究涉及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领域,从广义上说,就是从宏观、微观视角研究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政策法律文本、话语实践、政策制定过程、实施策略、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等不同方面。Johnson (2013) 将 LPP 的活动分为创建、解释、应用和示例四个部分。上述四个阶段包括的要素有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实施者、解释者、评估者等,都涉及能动性及其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Ricento (2000) 将 LPP 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去殖民化、结构主义与实用主义时期,第二个是现代化失败、批评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接触时期,第三个是新世界秩序、后现代主义与语言人权时期。在第一时期,新兴独立国家纷纷确定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涉及问题包括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语言教育等,其语言行为多是政府采取行动去解决语言问题,而对语言政策行动者的能动性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在第二时期,LPP 研究者更关注从批评的视角去研究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特别是不同的机构行动者是如何来实施语言政策的,关注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一时期对能动性的关注同第一时期一样,但更多地从批评视角出发,如在一定的语境下,压迫通过语言来实施,而能动性被看作是对压迫的反抗(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在第三时期,语言政策被看作一种话语实践,蕴含着意识形态,LPP 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学者们也因此

关注 LPP 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维度(Kaplan & Baldauf 1997)。宏观维度指传统的 LPP 研究中的政府实施者,微观维度指地方社区,而中观维度指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传统的 LPP 研究通常关注政策文本本身,如语言法、语言政策文本,而当前 LPP 研究的范围更广,更关注语言政策制定的过程,特别是关注不同语境中的行动者,如学校、学生、教师、商业领域、移民社区、教堂、体育社团、城市、家庭等,详见 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 的述评。有鉴于此,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体现了语言政策研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当前 LPP 研究中受到关注,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政策研究中的诸多实际问题。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立即在语言文字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当时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客观世界影响下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什么形式、怎样具体实施体现出了制定者们的能动性。最初研制的是四种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但是没有得到代表们的认可。后来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受命研制拉丁字母形式草案,并于 1956 年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经过激烈讨论和修改,最终颁布的方案选择了拉丁字母形式(王理嘉 2009)。这是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结果。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涉及以往问题、现实挑战和未来目标,与能动性理论中的三个要素相吻合。赵守辉(2021)认为,国际 LPP 领域近一二十年对规划者及其能动性的重视标示着该学科研究范式或理念的一个根本转化,从实践层面到思辨层面再上升到理论层面,这是一次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革命性转换。

2.2 研究内容

能动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中,Emirbayer & Mische (1998) 的影响力最大,他们从社会学视角探讨能动性问题,认为能动性是一种社会参与中的时间嵌入过程,源于过去,展望未来,又面向当代。根据这一定义,能动性被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植根于“时间—关系”的结构化社会情境,并与之产生持续的互动。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互动和参与过程,能动性既受益于过去(习惯),又导向未来(作为一种想象多种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并落脚于当下(作为一种综合过去习惯和筹划以应对眼前偶发状况的能力)(Emirbayer & Mische 1998; 肖莉娜、袁园 2019)。Emirbayer & Mische (1998) 将能动性分为三个要素,一是重复(Iteration),二是

筹划 (Projectivity), 三是实践性评估 (Practical evaluation)。重复是一个以过去为导向的能动性成分, 反映了在新语境下受过去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影响的一种再生产能力 (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 即个体能够有选择地激活过去的思维图式和行为方式, 以例行的方式融入现下的实践活动中, 以此来维持稳定、秩序、认同、意义及持续性互动 (Emirbayer & Mische 1998; 肖莉娜、袁园 2019), 如过去的语言实践或政策可能会对新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筹划是能动性中以未来为导向的一个因素, 包括未来行动相关的想象过程, 行动者可以根据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恐惧和渴求来创造性地重构他们已有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并且通过想象构思出未来行动的轨迹 (肖莉娜、袁园 2019)。在 LPP 语境下, 筹划意味着在当地语境下, 行动者要通过新的语言管理处理语言实践中的问题, 如教师发挥能动性, 通过新的方式去解决语言问题并对新的政策形成反馈 (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实践性评估是以现实为导向的能动性因素, 蕴含着行动者在可能的行动中做出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行动者在面对现实发展中涌现的模糊、矛盾和不确定性时, 有能力即时地判断和选择应对方案并予以执行, 即使此前他们并未经历过与之类似的情景 (Emirbayer & Mische 1998; 肖莉娜、袁园 2019)。Emirbayer & Mische (1998) 区分了实践性评估的四个过程: 寻找问题、理解性质、衡量决策和行动实施。在 LPP 进程中, 上述过程与 LPP 的目标确定、实施和评估等都密不可分。能动性的研究早就引起 LPP 学者的重视, 如 Zhao & Baldauf (2012) 就探讨了 LPP 规划主体的能动性问题, 并将语言政策决定中的可能行动者分为具有权力的人、具有能力的人、具有影响的人和具有兴趣的人等四类。Ball *et al.* (2011) 认为在学校语境中, 政策的行动者可以涉及以下角色: 叙述者、实践者、旁观者、批评者、接受者等。Bouchard & Glasgow (2019) 认为语言政策可以作为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一个过程, 进而从语言使用的语境和领域、作为文化和客观世界资源的政策等方面, 提出了 LPP 中能动性研究模型。学者们将其应用到外语教育政策的个案研究中, 如 Cheng & Li (2021) 采用 Zhao & Baldauf (2012) 的分析框架, 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7) 为研究对象, 通过质性研究, 将 LPP 的行动者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 认为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是大学英语教育中的主要行动者, 在今后研究中应予以重

视。《语言规划中的当前问题》2021 年专刊还从生态学、能动性理论框架、教师和学生能动性等维度对不同国家做了国别个案研究。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外语教育活动进行规划和指导是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方面, 这也是国家语言能力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外语资源的掌控, 外语教育能力的提升等 (张天伟 2021b, 2022)。我国为建设国家语言能力, 出台过多种外语教育规划文件, 如 1964 年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提出了确立英语学习的地位、新建外语院校、派遣留学生学习小语种等多项举措。此后, 虽然国家未再发布相似的规划性文件, 但在具体的教学指导、语种设置、学科发展方面, 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 如 2015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7 年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等 (张天伟 2021a)。这些规划工作说明外语教育政策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对外语教育实践有极大影响。从具体实践来看, 外语教育涵盖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等多语种,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全学段, 包括课堂、学校、社区和国家等不同层面; 外语教育政策与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普及和传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保护、盲文手语的规划等都密切相关;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中也涉及教师、教材、教学法等传统的“三教”问题, 以及教育技术、人才培养、语言服务等相关学科交叉问题。这些都可以在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理论视角下加以分析。

3. 外语教育政策的能动性过程

外语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互动和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 而语言差异仍是不同国别、不同民族间沟通的最大障碍。因此, 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影响本国的外语教育, 也影响到全球语言生态。从外语教育政策本身来说, 其作为一种过程, 按照产生作用的时间, 可以分为制定期和实施期两个阶段, 不同阶段的能动性所涉及的主体、领域、能动方式都有所区别。

3.1 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期的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研究

Layder (1997) 将社会生活分为四个主要领域: 心理传记、情景活动、社会环境和背景资源。前二者通常与能动性相关, 后二者与客观世界相关。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期,发挥能动性的主体主要是决策者和一部分参与者。决策者如教育主管部门,参与者如能影响到具体决策的专家学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他们一方面通过对已有客观世界,即现有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实践状况、社会生活变化等社会环境进行反思,同时又受到本国文化传统、思维特点、具体国情等背景资料的制约,通过个人的能动性汇聚成集体能动性,对政策进行讨论、修改、应用并最终推出。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语教育以俄语为主要教学语种,1954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等文件。这一政策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及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一工作涉及到建立教学学校、确定教学对象、编写教学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发布考试要求等诸多事宜,每一项都有具体的参与人员,每位参与人员根据自己对这一工作的理解提出建议、进行实践,最终汇聚成集体意志,才有了后续一系列关于俄语教育的政策规划。此后,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语教育主要语种转向英语,“一带一路”倡议后更重视非通用语教育,首要原因都是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是大势所趋。但每一次政策的提出和制定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反复研讨,多次修改,这一过程反映的就是政策制定期决策者与参与者的能动性作用。

外语教育政策不仅仅是政策文本本身,还包括预期目标、制定过程、实施效果、参与人员等,这本身就涉及外语教育的各个环节。如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该文件要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等。改革前提是为了解决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调研、专家讨论、社会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等不同阶段,涉及教育部、地方考试主管部门、试点地区、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媒体等不同对象,这些都在不同维度影响了《实施意见》的制定。另外主流媒体、地方媒体与自媒体互动,构建了高考改革的话语实践,体现了政策制定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范式的互动过程。各方围绕着“全民教育与考试一刀切”“一科多考与一考定终身”等现实问题,不断修补和完善政策,形成了最终的发布文件。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

就是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3.2 外语教育政策实施期的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研究

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并颁布之后,指导着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实施,形成外语教育实践中的客观世界;教育实践中的各级主体和参与者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发挥能动性,对客观世界施加影响,促使其不断变化,动态发展。

3.2.1 外语教育政策指导和规范外语教育实践

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一般大家熟悉的都是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它们一旦发布,就成为教育实践中的客观世界,对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有很大的影响,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如外语课程研究中要涉及外语教学课标,课标指导课程建设和研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根据我国基础外语教学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整,一是在语种设置方面,除保留原有学习科目英语、日语、俄语外,还增加了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二是在课程形式方面,将课程类别调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3)。根据这个最新标准,高中的外语教学实践就必须调整,开设的外语课程语种、课时、内容等都要进行研究。课标的制定就是一种宏观的外语教育政策,发布之后成为指导高中外语教学实践的客观世界。如课标与语言测试密切联系,《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教考关系、考试命题、课程实施方面与高考综合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影响高中外语教学具体实践。这与Shohamy(2006)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是相吻合的,她认为语言意识形态和事实语言政策之间存在6种关系,分别是规章制度、语言教育、语言测试、公共空间的语言、宣传等,她将语言测试纳入语言政策的整体研究框架。外语教育政策指导课程建设,而外语课程建设又反哺政策的制定和修补。

又如国家教育规划对具体的语言研究也影响巨大。2018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上指出,我国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在外语教育领域,有关“新文科”的研究立即成为热门研究主题。如图1所示,在中国知网中以“新文科+外语”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9

年只有 14 篇,2023 年预测将达到 336 篇。所以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对外语教育的具体研究方向也起到指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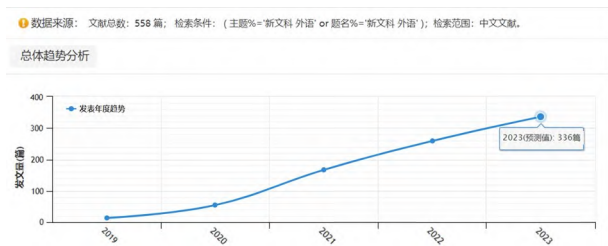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知网“新文科+外语”发表年度趋势 (查询日期:2023-05-04)

3.2.2 外语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

外语教育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外语教育实践,因此,理论也好,政策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实践服务,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Ricento(2010)认为,语言政策和研究在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之后,更注重研究微观方面的语言实践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如 Menken & García(2010)关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角色问题,分析教师在语言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行为,探讨教育者到底在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中发挥何种作用。这是对教育实践中个体能动性的反思。

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每次的外语教育政策调整都关系到每一位学习者及其家庭的利益,因此受到极大关注。不仅教师、学生、研究者关注外语教育问题,社会大众也普遍关注这一领域,这从近十年全国两会有关外语教育的议题中可见一斑。2011 年,人大代表徐秋芳建议大学英语六级通过者考研免试英语;2012 年,政协委员俞敏洪建议将英语高考总分从 150 降低到 80;2017 年,人大代表李光宇更是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2020 年,政协委员王茂虎提出建立健全我国小语种翻译人才管理体系;2021 年,政协委员许进提出取消英语中小学主科地位。每年的相关议题都会在社会舆论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同时影响国家的语言教育决策。比如 2021 年“取消英语中小学主科地位”提案引起大众关注,成为舆论热点之后,不少相关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2021 年 7 月 12 日,上海市教委印发了《上海市中小学 2021 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小学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科目只进行考查。”这意味着小学期末考试将不再有英语学科。这种调整很明显与我国目前的英语教学实践情况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应有较大关

联,是解决实践中出现问题的不断探索。

外语教育的实践形式和效果也同样反作用于中观与宏观的外语教育政策。1978 年恢复高考后,高考成为中小学教学的指挥棒。英语作为高考的主要考试科目,四大能力之一的“说”却一直没有体现在高考英语试题中。以上海为例,上海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英语口语试,但考试人数较少,考试成绩仅作为部分专业的录取参考依据;2000 年实施机试后,考试人数增加,考试成绩依然未纳入总分;直到 2017 年新高考方案出台,口语测评才正式成为高考的一部分,以 10 分计入高考英语 150 分总分(徐雯 2021)。上海是我国外语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外语能力培养也一直强调“听说读写”四项并举,作为学习风向标的高考,什么时候把口语纳入考试范围之中,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语言学学习规律问题,更要考虑我国的外语教育实践。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的外语教学方法主要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翻译法,重读写、轻听说,因此,大部分中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所花费的学习时间不成比例。而且听说能力的差别与地区、经济等因素关系极大。如果把口语测试纳入高考之中,可能造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而 21 世纪以来,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外语教育水平也大大提高,有条件保障全市考生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英语听说学习,所以 2017 年将其纳入高考范围,是根据外语教学实际情况改变而做出来的政策调整。这也是外语教育实践能动性的一种体现。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不断影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开始取得突破的时代,外语教育的必要性这一问题被不断提及,甚至一度出现翻译学将被机器翻译所取代的说法。虽然外语教育的性质和目的并不是如大众所简单理解的翻译和交流,但不同学科的发展对外语教育本身的影响客观存在。如 2008 年开始出现的慕课(MOOC)形式,是传统的学校教育与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大学 MOOC 网站上搜索英语,能找到 1223 门相关课程(检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25 日),这大大丰富了外语教学资源,改变了外语教学实践的形式,方便了学习者。因此,在外语教育政策的中观层面,将外语教学与慕课形式相结合的研究从 2015 年起持续处于高位,每年都有 100 多篇相关文章发表。在宏观政策层面,教育部在 2015 年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推动我国在线课程

的建设;2018年以来,持续开展“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等线上课程的评选,2020年推动世界慕课大会召开,2022年又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顺应数字化时代要求,随教育技术、教学形式的发展而做出的调整,也是教育实践过程中参与者对政策能动性反馈的体现。

3.3 外语教育政策通过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成为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动性虽然一般指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和诠释,但能动性也可分为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个体能动性通过社会选择和重新组织形成集体能动性,作为整体发挥作用(Archer 2000)。外语教育政策在具体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既是每位参与者发挥个体能动性的过程,也是汇聚个体形成的一个个不同小集体发挥能动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育学科其他部分相互影响,共同构建整体学科运作模式,是外语教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语教育承袭第二语言教学而来,传统上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王文斌、李民(2017, 2018)将其理论基础界定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这些理论对语言规律的认识、外语教学的过程、课程学习的讨论提供指导。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外语教育学,同样以此为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客观世界之一。从宏观方面来说,国家外语政策的制定,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一定要符合语言规律与教育规律。如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国家制定有《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每个标准中关于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分布,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掌握,都必须以语言本体规律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为参考,否则的话,就会影响具体的外语教育实践效果。从微观来看,教师在执行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时,是完全按照课程标准按部就班,还是根据地区和学生的水平因地制宜,也是以实际的语言学习规律为依托,遵循一定的教学法。但是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还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内容和研究范式,这也能进一步扩展和丰富外语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如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转变受历时、共时维度影响,相互联系和互动,可以从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理论中的重复、筹划和实践性评估角度去解释。又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包括外

语教育产业政策及相关研究,而外语教育产业研究涉及语言经济学视角,要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考虑,受到经济规律制约。

外语教育学作为探究外语教育活动及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学科,理所当然要包括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因为外语教育和二语习得、母语习得不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习问题,还和社会发展、国际政治、国家战略、经济因素等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正是应用语言学与上述各方面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环节。因此王文斌、李民(2017)认为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是外语教育研究的第二个层面,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讨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专业发展的调控、外语人才的需求分析、区域发展的协调、外语种类的合理布局等议题。

我们认为,从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的视角而言,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涵盖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上述宏观政策的制定,还包括教师、学校、社区、研究者等不同层面的主体在政策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反馈及影响,以及这种互动形成的复杂过程。在外语教育学框架内,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涉及政府、社会、学校、教师、学生等宏观、中观、微观维度,每个行动者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是程度不同。外语教育实践作为客观世界,包括三教问题、教育技术等内容,会在不同程度上反作用于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实践与外语教育理论体现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指导实践,而实践反哺于理论。

从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可见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育实践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外语教育政策不仅受到外语教育理论的影响,还进一步扩充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各个方面共同在外语教育学框架下发挥作用。具体来说,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外语教育学科体系范围内处于顶层,对外语教育的具体实践起到指导作用,而具体的外语教学活动又具有能动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微观外语政策的执行。

4. 结语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外语教育理论这一客观世界基础上,通过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将一切与外语教育有关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并通过

决策者进行规划,影响具体的外语教育实践,实践中的参与者又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不断反馈,促使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并适应新的形势。所有个体的共同参与,为外语教育学的完善和发展贡献力量。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互相依存、动态发展,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虽然重要,但以问题为导向,以调研为基础,是其根本出发点。无实地调研、没有数据支撑的政策研究只是空中楼阁,将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理论研究与我国外语教育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兼顾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将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Archer, M. *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Ball, S., Maguire, M., Braun, A. & K. Hoskins. Policy actors: Doing policy work in schools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1(4): 625-639.
- [3] Bouchard, J. & G. P. Glasgow. Agenc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theoretical model [A]. In M. Bray, B. Adamson & M. Mason (eds.). *Agenc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Critical Inquiries*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2-76.
- [4] Cheng, J. Y. & W. Li. Individual agency and changing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Reactions to the new 'Guideline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21(1-2): 117-135.
- [5] Emirbayer, M. & A. Mische. What is agenc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4): 962-1023.
- [6] Johnson, D. C. *Language Polic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7] Johnson, D. C. & T. Ricento.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Situating the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3(219): 7-21.
- [8] Kaplan, R. B. & R. B. Baldauf.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9] Layder, D. *Modern Social Theory: Key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M]. London: UCL Press, 1997.
- [10] Liddicoat, A. J. & K. Taylor-Leech. Agency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20(1): 1-18.
- [11] Menken, K. & O. García (eds.). *Negotiating Language Policies in Schools: Educators as Policymakers* [C].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12] Ricento, T.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2): 196-213.
- [13] Shohamy, E.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14] Zhao, S. H. & R. B. Baldauf, Jr. Individual agency in language planning: Chinese script reform as a case study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12(1): 1-24.
- [15] 陈平. 语言交叉学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1): 13-25.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 [17] 王理嘉. 汉语拼音 60 年的见证与前瞻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9(4): 36-45.
- [18] 王文斌, 李民. 论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5): 732-742.
- [19] 王文斌, 李民. 外语教育属于什么学科? ——外语教育学构建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探析 [J]. *外语教学*, 2018(1): 44-49.
- [20] 肖莉娜, 袁园. 儿童的能动性: 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 [J]. *学海*, 2019(2): 72-78.
- [21] 徐雯. 口语测评在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中的实践——以上海高考英语听说测试为例 [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21(1): 21-27.
- [22] 张天伟.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a(1): 13-20.
- [23]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b(5): 12-24.
- [24]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的发展与比较研究 [J]. *外语研究*, 2022(4): 1-8.
- [25] 赵守辉. 语言规划实践与政策研究中的规划者主体及其能动性 [R].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座, 2021 年 5 月 28 日.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外语能力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2JJD740013)和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0SYLZDXM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言政策、句法学等。

责任编辑 周永平